

中国文艺界必须彻底摆脱诺贝尔情结。那不过是一位北欧阔佬遗下的一笔基金。它的选委会是西方人，它的标准势必是西方的。我不反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，但它必须立足于本国现实。它如颁给中国作家，当然还是去领，但咱们绝不能去就合它，或盯着它。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乔伊斯从不把那奖金放在眼里，但那无损于他那本名著的不朽。



萧乾

余墨文踪

Y U M O W E N Z O N G

我总记得在西方旅行，过人行道时，抬头见到的那醒目的告示：“你只活一次”。最能使人珍视生命的，莫过于死。

余墨文踪

Y U M O W E N Z O N G

蕭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余墨文踪 / 萧乾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0.1

ISBN 7-5306-2980-8

I. 余... II. 萧... III. 散文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573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75 插页 2 字数 158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定价:15.00 元

中国文艺界必须彻底摆脱诺贝尔情结。那不过是一位北欧阔佬遗下的一笔基金。它的选委会是西方人，它的标准势必是西方的。我不反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，但它必须立足于本国现实。它如颁给中国作家，当然还是去领，但咱们绝不能去就合它，或盯着它。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乔伊斯从不把那奖金放在眼里，但那无损于他那本名著的不朽。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萧乾先生去世(1999年2月11日)后出版的他的第一本遗作,收编了“余墨”、“拾遗”、“家书”三部分文字共计111篇。萧乾先生的音容笑貌、丰富经历、文字魅力、真知灼见委婉地展现于其中,使读者重新领略到这位著名的记者、作家、翻译家笔下所展现出的诱人景象。

目 录

余 墨

虚无缥缈的烦恼——释《蚕》	(3)
释《篱下》和《矮檐》	(5)
重读《栗子》	(7)
重读《落日》	(9)
《俘虏》，我的仲夏夜之梦	(11)
《一只受了伤的猎犬》：证明我不能写小说	(13)
我偏爱《雨夕》	(15)
《邮票》里的悲与恨	(17)
《邓山东》中的宣泄	(19)
诉诸感官	(21)
真实与翔实	(23)
我揭过一宗冤案	(25)
历史的创造者：《血肉筑成的滇缅路》	(27)
舆论·广播·宣传	(29)
事业与职业：《我与文学》	(31)
悲观是愚蠢，是没有道理的：《古城》	(33)

动物不会伪装:《殇》·····	(35)
不折不扣的吃人世界:《过路人》·····	(37)
朦胧的阶级观:《脚踏车的哲学》·····	(39)
也得有点酸辣:《塔塔木林》系列·····	(41)
难忘的一九五六:《大象与大纲》·····	(43)
故土情结:《往事三瞥》·····	(45)
生活中的遭遇(二则)·····	(47)
时代的写照·····	(49)
主人与主子:《坐船犯罪记》·····	(50)
回首《梦之谷》·····	(52)
一厢情愿:《欧洲往哪里走?》·····	(55)
《依皈》的时代背景·····	(57)
《印子车的命运》的寄托·····	(59)
《跳出来说》说什么?·····	(61)
文字写生:《雁荡山》·····	(62)
只能自救:《叹息的船》·····	(64)
关于《中国舞台的歧途》·····	(66)
梦游《永不再乡》·····	(68)
寻根旅行的产物:《万里赶羊》·····	(69)
《从心理学角度》的思考·····	(70)
《我的医药哲学》的关键·····	(72)
《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》是假借·····	(73)
关于死的反思·····	(74)
放心·容忍·人事工作·····	(75)
朦胧的敬慕·····	(76)

纳粹轰炸下:《活宝们在受难》·····	(77)
《龙须与蓝图》的内涵 ·····	(78)
自言自语:《给自己的信》·····	(79)
《首都访冯记》的由来 ·····	(81)
《黑与白》的补白 ·····	(82)
《丑事》的产生背景 ·····	(83)

拾 遗

谈编选集兼记文洁若

——《萧乾选集》(香港版)自序 ·····	(87)
这碗忆苦饭非吃不可 ·····	(93)
吉庆,我多么羡慕你·····	(97)
与傅光明谈欧战 ·····	(99)
文学杂谈·····	(101)
可贵的探讨	

——序《死亡·悲剧与审美》·····	(104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龙应台惹恼了新加坡

——一场饶有意义的论战 ·····	(106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

——《柏杨回忆录》读后 ·····	(11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辉煌的再现

——评《中国新文学图志》·····	(114)
悼念海伦·斯诺·····	(116)
在战争的阴影下·····	(121)
读丁东的《和友人对话》	

——兼小议知识分子问题	(124)
抗老哲学	
——给自己做点思想工作	(128)
心 债	(132)
创作断想	(138)
我的恩师杨振声	(140)
我记忆中的“八·一三”	(146)
尴 尬	(149)
新出的徐志摩评传	(151)
饮食的记忆	(153)
写在《戴厚英文集》出版之际	(156)
《短篇小说集》序	(158)
诗与散文	(159)
吃的联想	(161)
中国文艺往哪里走？（外一章）	(166)
序《世纪肖像》	(168)
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有感	(169)
才女林徽因（代序）	(171)
序《波涛上的足迹》	(174)
内 疚	(177)
我的学历	(180)
关于报纸副刊的编法	
——为国际华文报纸副刊研讨会作	(186)

家 书

写给妻子文洁若的信(四封)..... (191)

写给儿子萧桐的信(十五封)

..... (19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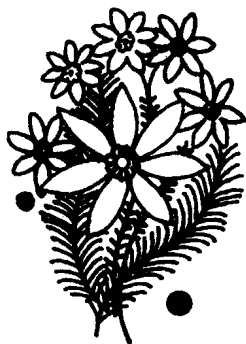
写给三姐文常韦的信(十三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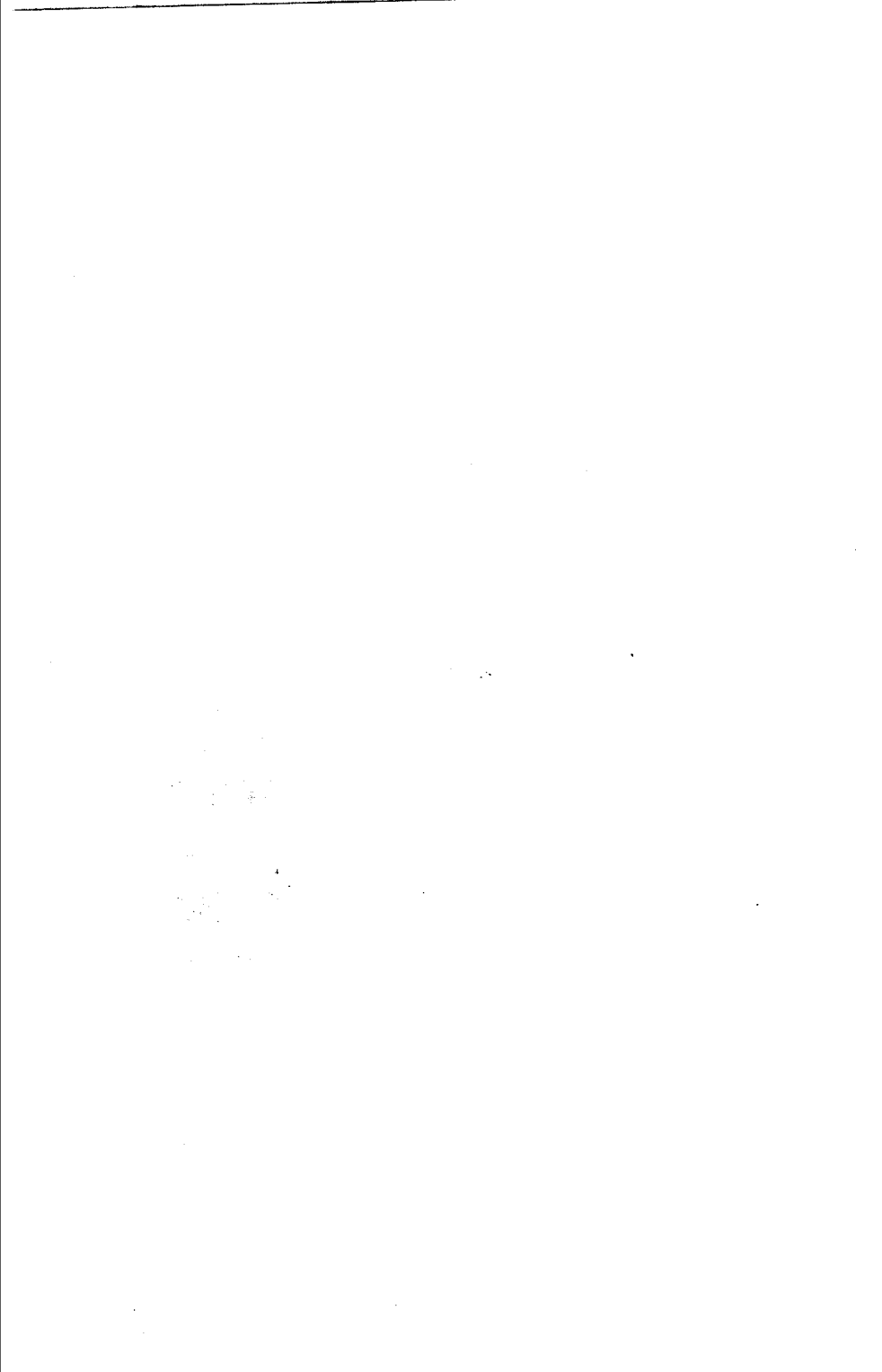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(219)

编后记..... 延梅(235)

余

墨





虚无缥缈的烦恼——释《蚕》

一九三三年写第一篇小说《蚕》的时候，我二十三岁，怎么那时我就为宇宙间有没有神这么个玄而又玄的问题困扰起来呢？

这，不能不追忆起我那古怪的童年。

那是二十年代，我上的是教会学校。白天要成章地背诵《新旧约》——一九二五年以前，强迫宗教还未废除；晚上回到堂兄家，就得陪他拜佛。他因为失业，那时各路菩萨都拜。尤其初一十五，我得陪他给供的神位叩上几十个头。白天，我得信奉黄头发大胡子的耶稣，晚上得礼拜南海观世音菩萨，更可怕的是夜晚！得听睡在同一炕上的一位远房老姑姑拜狐仙爷。她按着我的脑袋要我望空给那位狐仙叩头，并且听她向狐仙念念有词。

我从不信神，可那时却切身地感到神的存在。至少，我的小小心灵曾为这而困扰过。《蚕》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当时做出的结论：“即便有个神，它也必是变幻无常，同时，望了人类遭际徒然爱莫能助的。蚕的生存不是神的恩泽，而靠的是自身的斗争。”（见《创作四试》第三页，文化生活出版

社，一九四七年版）我并且在同一文中指出这是用达尔文的《天演论》否定了命运。当蚕闹起饥荒时，神也无能为力。

这篇小说的背景是福州仓前山。一九三三年我刚从那里教书回到北平。小说的女主人公梅是以已故高君纯为原型的。那时，她其实是个没到过福州的福州人，是我把她从北京搬到福州的，搬进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里。一九三三年，我们正在热恋着。

小说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写的。那天我正坐在石舫上对着花神庙发怔。忽然灵机一动，奔回六楼一气呵成的。而且写完之后就蹬上车，一口气骑到达子营的沈从文先生家，吞吞吐吐地告诉他，我写了篇东西（没敢说是小说）请他给指点指点。那大约是九月初吧。虽然知道他正同杨振声先生合编《大公报·文艺》，可我并没指望他会刊用。我后来是在文学院楼外阅报板上偶然见到的。

当时我那兴奋劲儿，自然不难想出。

更使我吃惊的是，不久沈先生来信说，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了我的那篇东西非常喜欢，要请我去吃茶。

那天我穿上新浆洗的蓝大褂，骑车跟在坐着人力车的沈先生后面去赴茶会了。那天坐在林徽因女士客厅里的有她的先生梁思成、金岳霖教授，还有她的几位我现在已记不准的常客了，可能有朱光潜和梁宗岱两位教授。我端着茶杯坐在屋的一角，听他们夸着，自己恐怕连眼睛也不大敢抬。

我回想这事并无意吹嘘自己什么。我只是想通过这件往事，说明三十年代的前辈是怎样不遗余力鼓励青年的。

我就是在那样热情的鼓励下，写起来的。

释《篱下》和《矮檐》

我念过两年私塾，然后就进了洋学堂。所以连本《论语》还没念完，就学起“人手足刀尺”，接着就进了洋学堂。圣贤之书我懂得有限。早年的教育大多是庙会上受的，难免乌七八糟。

二十年代在隆福寺地摊上，花一个大子儿就能买上一个唱本儿。甚么《画扇面》、《丁郎寻父》，那时候我都能成套成套地背。其中有一本《名贤集》最为钟爱。我买过不少本，所以一直到“文革”，我身边还揣着一本。开头是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”。

那个小本本在一九五七年以后，发挥的作用可大了。那阵子我老在肚子里念道“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日夜阴阳”。一边念一边自己就想，天还有阴晴，人生怎能没点波折。那时旧日朋友都星散，有时在马路上碰到也掉过头去。就记起那小本本里的“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。把变化看作理所当然。

于是，心里就找到了平衡。

《名贤集》里那几百条“格言”中，对我影响最深的，莫如

“既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”，那是很没出息的两句。十六岁前，我寄养在堂兄家。堂兄有他妈妈护着，我的妈妈则外出当佣工，月头上才能见到一面，那时经常挨打挨骂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我就是靠那两句话活下来的。

重读《栗子》

经常听人谈到三十年代的京派和海派。在“九·一八”（一九三一年）之前，两地的空气和文风可能有显著的区别。那时的故都文坛以周作为盟主，他着力提倡的是明清小品。然而那以后，尤其巴金和郑振铎相继北上，在举国抗日的呼声下，我实在看不出京海之间有什么差别。那时，许多上海作家为北平的《文学季刊》和《水星》以及沈从文和我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艺》写文章，而北方青年也踊跃为上海刊物写稿。大家写的主题也都不外乎对外抗日，对内反对各种腐败和落后。一九三五年除夕我写的《栗子》就是写“一二·九”学运的。当时我正在巴金的鼓励下，努力冲出个人早年遭际的黑圈，把笔献给大众的事业。我并没有多少革命实践，但一心就想着战斗。

我是一九三五年由燕京大学毕业后就进《大公报》的。游行的壮举以及同学们被殴打受伤的事，我是当晚从新闻电讯稿中得悉的，第二天我就由天津赶回北平，并且陪斯诺夫妇走访了几家医院，看望了头上臂上缠了带血迹纱布的同学，听他们述说抡大刀军人多么野蛮。后来清洗出的照